

深切悼念周叔弢先生

冀叔英

建德周叔弢先生是当代著名藏书家。先生生平无他好，治事之余，惟尽力访求古籍善本和其他文物图书。建国以来，历次以所藏捐献国家，化私为公，高风共仰。今北京图书馆、天津市图书馆、南开大学图书馆、天津艺术博物馆等，皆得以先生所赠丰富馆藏。先生于古书秘籍，固有深知笃好，又佐以博学广识，故鉴别群书，独具卓见，方之古人，也无以远过。清代乾嘉间学者洪亮吉，曾谓藏书有数等，认为“得一书必推求本原，是正缺失，是谓考订家”；“次则辨其板片，注其错讹，是谓校勘家”；又次“则搜采异本，上以补石室金匱之遗亡，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览，是谓收藏家”；再次则“但求善本，独嗜宋刻，刻书之年月最所深悉，是谓赏鉴家”。洪氏之说，虽属一己之见，而旧时代一般学者以至藏书家，实际却也未脱“考订、校勘、藏、赏鉴”之道。先生之访书藏书，则与一般收藏家异趣：对书的选取十分严格，凡遇刻本，非卷帙完好，纸墨精良，则难以入选；而卷帙即使完好，如有俗笔涂污，或钤以恶印，或有割裂牌记之处，虽纸墨精良，也宁舍不取。对抄本、稿本，及前贤校跋手迹，则判别时代，鉴定真贋，更具真知卓识，为当代学者所推服。至于每得一书，手自校勘，考辨是非，推求源本，固不待言；尤重视藏书授受之渊源，一书流传之派衍，研考至精，更多前人所未道。先生于所藏及手校之书，每撰有题识。捧读这些题识文章，先生

崇高的思想境界和爱国主义精神，跃然纸上，这是先生留给我们的又一份珍贵精神财富。

先生之藏书，正所谓善藏善读，而收书藏书过程中，有数事为常人识见所不及，亦非常人所能办。古今收藏家爱其藏品，是所必然。先生的爱书，则具高瞻远瞩，为书擘画周详，期其流传久远。在多灾多难的旧中国，不但广大人民遭受苦难，就是祖国灿烂的文物古迹，如敦煌遗书、龙门石刻，也无不遭到帝国主义文化掠夺分子的任意盗劫，残酷破坏。代表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古旧书籍，其中具有丰富的资料价值，更是一些打着“文明”招牌的掠夺者的觊觎对象。解放前，每有古籍文物流往国外，先生目睹心伤，必竭力设法，抢先收购，以免外流。对于已经流往国外的书，也不惜重值，尽力购回，如宋版《东观馀论》，就是购回之一例。此书收回经过，见于先生所写跋文：“癸酉正月获见日本文求堂书目，著录宋、元、明本凡百余种，尤以北宋本《通典》，绍兴本《东观馀论》为最罕秘，盖海内孤本也。《通典》索价一万五千元，余力不能赎，乃以日金一千元购此书归国。独念今者边氛益亟，日蹙地奚止百里，当国者且漠然视之而无动于中，余乃惜此故纸，不使沦于异域，书生之见亦浅矣”。此跋写于癸酉，即一九三三年。后来《通典》终因悬价太高，力不能办，多年后每一念及，犹不胜感慨系之。先生的爱国之忧，于此可以想见。

古籍世代流传，难免破损残失，或一书分在数处。先生收书数十年间，凡遇同一书分藏数处时，必设法促使“团聚”，务成延津之合。不仅自己倡导力行，在南北访书时，也在在关注此点，为成全一书的“重圆”，尽心竭力。先生藏有岳刻《春秋经传集解》，此书卷后有“相台岳氏刻梓荆谿家塾”牌记，前人因认为相台本群经为宋代岳珂家刻本，而于《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》一书，也认为系岳珂编著。张政烺先生考证相台本群经乃

元初义兴岳氏据廖莹中世彩堂本校正重刻，与宋时岳珂无涉。相台岳氏本除此书外，尚存《周易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孝经》等，而此书之为传世仅见，固不在为宋为元而少损声价。先生之收此书，费尽辛勤，其间经过数年，由三家书店好不容易得到廿九卷，还缺首册卷一。后经多方访求，找到北京，又听说这一册已先被一龚姓用六百元买去，只能“展卷兴叹”了。过了一年多，听到传闻，龚姓所得的首册，已毁于上海闸北之难。这回没有办法了，痛心之余，只好设法求得宋抚州刻本《春秋经传集解》第一册，以补此书之缺。十多年之后，不想当年这册传说毁于闸北兵火的岳刻本，又出现了，并悬标出售。这个消息使得先生惊喜过望，赶快托人去商议，因对方抬价居奇，展转两年，此书方得谐价购回，配成全帙。一书之全，艰难如此，设非先生之苦心积虑，此书四分五散，结局也就难说了。先生配全此书后，因将原配入的宋抚州刻本第一册，捐赠故宫。先生在书中题跋记此事云：“余既获岳刻首册作延津之合，遂检前得宋抚州本左传二卷，宋汀州本《群经音辨》二卷，归之故宫。此二书纸墨精美，宋刻上乘，《群经音辨》犹毛氏旧装，所谓‘宣绫包角藏经笈’者，宛在目前。然故宫所佚，得此即为完书，余岂忍私自珍秘，与书为仇耶？去书之日，心意惘然，因记其端委于此。”对于藏书爱书的人，“去书之日”，虽然“心意惘然”，可是为书着想，又绝不忍心“私自珍秘”。类此的事，还不止一端。五十年代中，先生到上海，去上海图书馆看书，见有宋刻本《西汉会要》残帙一种，乃清代怡府旧藏，书原不全，先生想到自藏有宋本《西汉会要》一册，与此书原为一部，回津后不久，即将自藏宋本转赠上图，配入此帙。又一次，先生在上海，见上海图书馆有宋刻本《春秋经传集解》一册，为宋代鹤林于氏家塾栖云阁刻本，与北京图书馆所藏恰为一部，北图藏本原缺卷二十六，上海图书馆所藏，正是此卷。先生亟为作合，经上图同意，将此册移赠北图，

促成全书重圆。从古以来的藏书家，爱护书籍如护头脑的不少，可是对书具此胸怀的，能有几人！

先生为保全古籍而计划周至，还在讲求装修一事。古籍装修与字画的装裱，堪称我国传统工艺之双葩，我国书法艺术和绘画艺术的珍品，以及古籍中的写本刻本，传世在千年以上，以至七、八百年以上的为数甚多，设想如果不是有卓越的装裱技术在世代维修着，书写和绘画所用的纸或绢，岂能如此完整地保存至今。古籍情况也一样，古来藏书者多，若论讲求装修，又真懂装修技术者，就不是一般藏书家所能办了。从封建时代到现在，书籍装修的技术和书的外形，是随书籍的时代发展而发展的。先生于古籍装修，独具卓识，力主维护旧装，以存古籍之时代面貌。维护旧装在技术上要求更高。因此，在一九五九年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，先生与著名版本目录学家、古文献研究专家徐森玉先生联名提出一项提案，建议设立古籍装修技术培训班，以两年为期，结业时要求能较为全面地掌握装修技术，使我国这项传统工艺得以继承发扬，后继有人。提案获得通过，由文化部付诸实施，学员从全国各省、市图书馆选送，在北京图书馆和北京中国书店各设一个班，由两个单位有专长技术的老师傅任教，在实际操作中学习锻炼。从一九六二年至六六年初，共有两期学员学成毕业，第三期开始后因十年浩劫半途中止。结业的学员中现有不少在各馆为古籍辛勤工作着，二十年来有的还带了一批批的徒弟，使传统的古籍装修技术连续不断，为四化建设贡献力量。先生对于装修技术和前代的旧装，十分懂行，将装修技术看作是维护古籍善本使之流传久远的一个重要环节。先生在藏书题跋中，常常讲到装修问题，卓越的见解，对从事古籍工作，尤其是图书馆工作者来说，是大有启发并应该很好地学习的。试举几则来看，如跋《復古篇》云：“张有復古篇宋元旧刻传世极稀，诸家书目所著录者多为钞本，此元至正好古斋本，字画精雅，宋

讳缺笔，盖从宋本繙雕。…甲戌，藻玉堂书估王子霖携以示余，因以重价收之。惜纸经染色，觸手即破，乃命工重装，围以素纸，居然面目一新，以便观览，书之寿命亦得延长，固无嫌于损旧装矣。”跋《纬略》云：“…此本惜经俗子改装，已非士礼居之旧，殊不耐观，乃命工易书衣及前后副叶，书中衬纸则未换，恐拆订伤书也。余所见古书能多存旧装者，当推海源阁，若今人知重此者益鲜矣。”跋《注心赋》云：“……近年颇见杨氏藏书，皆善保旧装，不轻改易。此书则因辗转流传，遂横遭割裂，而装池更污损，非复旧观，既命工略加补缀，爰记数语以寄慨云。”跋《李文公集》云：“余初见此书时，尚是旧装一册，与《结一庐书目》合，旋为书估改装四册，古意遂漓矣。余尝谓书之精神在纸光墨采中，非极渝敝，不可轻付装潢，况世之能手如钱半岩者又不可多得耶！”这里虽讲的是装修，对于如何保养维护古籍，也可以思过半矣。其中说到的“世之能手钱半岩，乃是清代嘉庆前后苏州地区的一位能工巧匠，当时苏州著名藏书家黄丕烈所藏的珍本，多出钱半岩之手装修，黄氏的题跋中提到钱半岩不止一处，如黄氏跋《近事会元》云：“装池出良工钱半岩手，近日已作古人，惜哉。其子虽亦世其业，而其装池则未之见，不知能传父之手段否？”可见装修一事，为藏书家所重视，这也在于装修能手可以使书延长寿命，反之也足以毁书于一旦，这和医家之治病，是有相同之处的。

先生的藏书题识，涉及学术面很广，诸如有关目录学方面的考订，版本之源流，文史知识，以及抄校本的鉴定，乃至藏书家小掌故，无不包容。从中能够学到许多知识，而且有些还是由书本无从学习的知识。先生定居天津后，几十年来，蓄书日富，宋元故槧，名校精抄，其中得之南北旧家散逸者甚多，皆属渊源有自。清季后期，论藏书名家每称“南瞿北杨”（瞿氏铁琴铜剑楼和杨氏海源阁），当代则咸推“南陈北周”（南陈系祁阳陈清

华），后先辉映，虽百宋、千元之藏，也无以多让。先生藏书即蔚为巨观，或以为竭其财力，不惜善价所致，实则不出善价固然难得好书，只凭“财力”而无鉴别的眼力，同样收不到珍品。另外，或者说藏书也反映了一定的胸怀、气度、思想、情操，试举几例以见先生对待书的卓越之见：明嘉靖刻本《齐乘》，先生原已出让与人，一年后又复收回，加价一倍有半，可是先生说：“此书本非罕秘之籍，而余今年财力之窘，更甚于去年，然惜书之癖甚于惜钱，结习之深，可笑亦复可悯也。”购入明成化刻本《唐甫里先生集》时，书估索价甚高，原来也不想购入了，先生跋称：“余年来无力收书，留案头二日还之，既而思此等书世不多有，若失之交臂，恐不易再得，遂勉力购而藏之。”收宋余仁仲刻本《礼记》，也是花了重金的，先生却说：“…支硎山人钱物可得，书不可得，虽费当弗校之言，实可谓先获我心。”对宋刻本《后山诗注》，是从人借贷，倍其值收得的，先生说是：“余则以为人生几何，异书难遇。”对于众多得之不易的珍本古籍，先生不止尽收集之功，既收之后，又为之装修补缀，妥制匣套，或存其旧装，保护周至。古今收藏家每于书画古籍，多钤以私印，甚至多多益善，先生于自藏各书，钤印极少，最多只钤小方印一章，且多选其板框之外，不占明显之处。先生尝说书籍钤了恶印，如古时犯人脸脸上刺印一样，实是毁书之举。先生不用大印章，也舍不得随意在书上钤印，爱书到如此程度，可谓无微不至了。建国后，先生将多年珍藏，一举捐献国家，认为“图书文物来自人民，应该还之人民，”“由国家收藏比私人收藏要好得多”。这正是先生多年的心愿。

先生与北京图书馆渊源甚深，六十年来，历任善本部主任徐森玉、赵万里诸先生皆与先生道义相交，时相过从。多年来，每逢新有发现之书，必相与赏奇析疑，互为质证。志同道合的基础，还在于对书籍，尤其是版本方面的古籍，有共同的真知笃

好，共同的以保存祖国文献为己任的崇高意愿。先生虽不是身居其位的图书馆工作者，可是为充实图书馆的善本书藏，常与徐、赵诸先生共相擘画筹措，襄赞之功，实际等于一位名实相符的顾问。建国以来的三十多年中，先生每因公往来京津，遇有馀暇，必来馆看书，或询及工作情况；举凡诸家捐赠之书到馆，以及馆藏善本书目之出版，先生均关怀备至。每于新获善本书版本及校跋、鉴定，以至装修，书目印行及具体类目之增删调整，凡有请教之事，俱得先生热心指导。周恩来总理病重期间，曾指示“要尽快将全国善本总目录编出来。”一九八〇年善本总目编辑人员集中开始工作，总目编委会特敦聘先生任顾问，先生虽年登九秩，而神志清朗，于善本总目工作犹在在关垂。我以后生晚辈，有幸得聆先生教诲甚多，受益良深。先生平易近人，待后辈多谦虚体谅，且诲人不倦。先生耆年硕德，为世所敬仰，今不幸长逝。先生的高风亮节，爱护民族文化所作的贡献，典范犹存，将是推动图书文物工作者前进的力量。我们一定要尽力将善本总目编出来，使之为实现祖国四化作贡献。

